

搭建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桥梁：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ocial Reality: The Value Cho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陈后亮（Chen Houliang）

**内容摘要：**文学伦理学批评既借鉴西方理论资源，又深入中国的文学文化语境，以强烈的责任感搭建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桥梁。在立足于文本的前提下，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文学的伦理价值及道德教诲功能，提出了能够有效运用于具体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充分体现出以聂珍钊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文学批评现状的整体把握和对文学研究走向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价值选择；理论建构；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陈后亮，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英国小说和美国非裔文学研究。

**Titl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ocial Reality: The Value Cho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ot only draws lessons from Western theoretical resources, but also goes deep into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text, so a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ocial reality with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close reading of literary work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ays attention to the ethical value and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puts forward a pragmatic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fully reflects Nie Zhenzhao's reflex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roblem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his deep concern for the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value choic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ethical selection

**Author:** Chen Houlia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s ar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nglish fiction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henhouliang@hust.edu.cn).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理论是否终结”的激烈争论声中，西方文学批评逐渐陷入困境。甚至是像 J. 希利斯·米勒这位曾经的理论大家也对批评理论过度关注政治问题、忽视文学文本在批评活动中的中心位置的倾向提出质疑：“他们写作、教学的方式常常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他们在写作和教学中常常把文学边缘化或者忽视文学。”（18）于是，很多研究者开始对各种政治问题感到厌倦，他们把着眼点不再局限于文本中的种族、阶级、性别、身份等要素，而是将兴趣再次转移到一个古老的话题，即文学与人类伦理规范的建构和道德生活的关系。相应地，“伦理批评的复兴”或“伦理学转向”<sup>1</sup>成为西方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正如尚必武所指出：“尽管西方的伦理批评源远流长，但是由于其一直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系统理论体系，尤其缺少明确的方法论，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批评学派”（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聂珍钊教授以敏锐的学术意识和深厚的人文情怀认真反思了当前国内过分移植西方批评模式而导致的弊端，并从文学活动的伦理视角出发，独创性地建构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体系，不仅深度参与到与西方学者的交流对话中，而且发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强音。在聂珍钊教授新近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他纵观文学研究现状，聚焦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既在整体上把握学术前沿，又在细节上讨论具体问题，体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的深度结合，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宏大气魄。

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学界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批评理论的引入与运用虽然促进了我国文学研究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理论脱离实际、伦理价值缺位等情况较为常见。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既借鉴西方理论资源，又深入中国的文学文化语境，以强烈的责任感搭建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桥梁。在立足文学作品的前提下，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文学的伦理价值及道德教诲功能，提出了有效运用于具体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不少国内外学者积极参与到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相关的讨论中，进一步推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事实证明，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方法中，文学发挥着“无用之大用”的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解释和分析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提供了参考，为当前的文学批评注入了活力。

### 一、价值选择与伦理选择

价值选择体现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立场。聂珍钊教授明确指出：“文学的伦理价值就是文学的正面道德教诲价值。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

1 相关背景可参阅陈后亮：“伦理学转向”，《外国文学》4（2014）：116-126。

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8)。伦理价值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这一点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文学批评中都是可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文学为伦理与道德的产物，坚持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这个基本立场构成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各种批评流派的关键区分，也回应了人们在“文学死亡论”和“理论终结说”背景下对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的期待。可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这一价值选择本身就彰显了中国学者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如果说价值选择突显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伦理关怀，那么伦理选择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无疑是打开作品所蕴含的道德宝藏的一把钥匙。聂珍钊教授表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伦理选择理论上建构了自己的批评话语”（“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7）。一般而言，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伦理选择最常见的是两类：一类是将危害社会和伦理秩序的伦理选择转换为警示或劝诫；另一类是将体现楷模或榜样作用的伦理选择转换为道德范例进行鼓励。这两类都发挥了帮助人们弃恶择善的道德教诲作用。

我们以18世纪的英国罪犯传记题材小说为例。作为一种风格鲜明的通俗文学，这一类作品通常具有明确的道德意图，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参与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建构。这些犯罪传记虽然在文学技巧上十分欠缺，但却发挥着教导人们如何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的作用，是对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维护和强化。例如，在一部经典的罪犯传记作品前言中，作者明确表达了他的道德劝诫意图：

我把这些事迹公之于众的目的绝非是为了让世人效仿他们，而是为了让读者从中得到威慑，以免犯下同样的罪过，以他们的不幸为前车之鉴，从而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的更远。我相信凡是有正常理性的人，在看过这些可鄙之辈的罪恶一生轨迹后，都不会试图追随他们的脚步，那将是通往绞架的道路。因此，我在这里只展示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如何跌倒，并希望没有一个聪明人会受到他们的引诱去效仿。(Smith 211)

很明显，这类小说的道德教诲功能远大过其审美价值。鉴于人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理性意志，其主要特征是能够做出价值判断，分辨善恶。兽性因子是人身上所体现的动物性本能，是人身上的非理性因素，犯罪者在实施犯罪活动时，动物性本能占据上风。罪犯传记就是警示人们要控制身上的动物性本能，从而成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真正的人。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来看，18世纪的英国罪犯传记恰恰体现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描绘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的伦理选择过程”这一论断（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

构”74)。透过罪犯传记的犯罪行为描述，我们能够看到主人公在做入还是做兽之间的伦理选择。虽然罪犯传记中的罪犯实施了犯罪行为，破坏了法律或者损害了道德秩序，但这类作品能为读者如何做一个道德的人带来启示，并产生道德自律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罪犯传记都是以犯罪人员的伏法认罪作为结尾，并突出他们的破坏行为所受到的惩罚。通常，罪犯会在牧师的引导下在狱中或在受刑前做长篇虔诚的忏悔，这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道德拯救，从而突出并加强作品的教诲功能。通过阅读这些罪犯传记，读者获知他人是如何选择，并将这些选择导致的结果作为自我选择的参考，约束并扼制潜在的或隐藏的犯罪倾向。就如聂珍钊教授所说：“在伦理选择中，人需要通过理性约束动物本性，强化人的道德性，同时对动物本性保持警觉，将其管控在伦理允许的范围之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5）。不难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助于从更广的视域探讨罪犯传记的价值，可以深层地发掘罪犯传记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丹尼尔·笛福、塞缪尔·理查逊和亨利·菲尔丁等更具经典意义的18世纪英国小说家也都是把文学创作的主要意图定位于道德教诲，并在他们为小说所做的“标题”、“序言”和“献词”等部分明确表述出来。例如理查逊为他1740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所起的副标题就是“美德有报”。而且，在道德立场上，作者显然站在女主人公帕梅拉一边。伊恩·瓦特认为，“《帕梅拉》的戏剧性情节所表现的是当时真实的道德态度和社会态度”（168）。理查逊的第二部小说《克拉丽莎》的道德主题更为明显。具体而言，“理查逊创造了一种文学结构，一种将叙事模式、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道德主题融为一体的结构”（208）。同样，这部小说的完整标题《克拉丽莎，或者一位年轻女士的历史：理解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揭示父母和子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失策可能造成的种种困扰》更是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态度。瓦特明确指出，“说到克拉丽莎，理查逊显然想把这个人塑造造成一个道德楷模”（213）。可见，对于理查逊的这两部小说而言，“道德楷模”显然是理解其作品的关键词。

菲尔丁的代表作《汤姆·琼斯》为我们呈现出18世纪前期英国的社会生活，也体现了作者强烈的道德意识。在该小说正文前的“献词”中，菲尔丁不但明确表达该作品无伤道德：“在全书中定无有害宗教、有伤道德之处，绝无不合严格礼教风化之点”（6），而且多次强调他写作此书是出于道德教化的目的：“我在此书中全力以赴者，端在善良与天真之阐扬”（6）。他甚至郑重宣称：“因一副榜样即一幅图形，在此图形中，道德即成为有目共睹之实物，且于其玉体莹然裸露之中，使人起明艳耀眼之感”（6）。显然，菲尔丁意识到文学作品中道德榜样能够引发大众读者的崇敬仰慕之情。更重要的是，菲尔丁也看到读者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经验，将之付诸于行动，从而有助于他（她）们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就此，他这样写道：“除阐扬道德之美

以使人仰慕敬爱之外，我并使人深信，人之真正利益端在追求道德，以此试图诱人以道德为动机而行动”（6-7）。不难看出，这部小说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消遣，它更多地是出于道德教诲的目的，指引人如何通过伦理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可贵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伦理选择活动与伦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聂珍钊教授对此有过表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按照这种思路，“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16）。这种对文学与其伦理环境关系的辩证、客观的论述力图避免用现在的眼光评价过去作品的弊端，对具体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现象提供了有益指导。

## 二、理论建构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带有明显的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征。无论是在处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它批评方法的关系方面，还是在探究文学作品本身各要素的伦理特点上，聂珍钊教授都能够统揽全局，既从大处着眼，又从细节论述，充分体现出他对文学研究之共通性与文学伦理维度之独特性的综合考量。

### 1. 文学审美与道德教诲的“阶段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尝试打破长期困扰文学研究的一个二元对立立场，即：“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伦理还是审美？”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文中可以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没有否认文学的审美价值，更没有把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与文学审美对立起来。在聂珍钊教授看来，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恰恰是在文学审美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打破了教诲功能与审美追求非此即彼的狭隘视角，从而不但能够从新的向度认识审美和理解审美，而且高屋建瓴地把握了文学的内在本质。

聂珍钊教授尤其强调文学批评在处理文学审美与道德教诲关系方面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批评家的道德责任。就此，他这样说道：“文学作品伦理价值的实现分为审美和批评两个阶段。文学审美是低级阶段，主要通过阅读而理解文学作品，目的在于欣赏（……）文学的审美虽然是文学认知的低级阶段，但它是文学批评的前提。没有文学的审美，就不能进入文学批评阶段。文学批评是高级阶段，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对文学作品的理性认知，是通过批评对文学作品作出好坏的价值判断，目的在于获取道德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9）。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审美与道德教诲“阶段论”的阐释力图融合二者，尝试规避文学批评中经常出现的

两极化倾向。

## 2.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它研究方法的兼容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但不排斥其它批评方法，而且在理论建构中积极倡导其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心理和精神分析等多种批评方法的结合。聂珍钊先生强调：“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往往只有同其它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发挥用伦理学方法批评文学的优势”（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23）。正是这种广泛的兼容性灵活地丰富并拓展了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使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多元层面上有效展开。

在当今时代，固步自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建构很难取得大的突破。在聂珍钊教授的引领下，文学伦理学批评被定位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92）。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一文中，聂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将文学同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与法律、计算机科学、神经认知等不同学科结合起来的倾向，开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转向。这种跨学科研究必然会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完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深入发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92）。不难看出，在跨学科研究的宏大视域下，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 三、脑文本与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

聂珍钊教授不但注重文本细读与理论建构的结合，而且具体阐释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本观。在这方面，脑文本理论是他在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他开创性地提出了文学的三大文本形式，即“以大脑为载体的脑文本、以书写材料为载体的书写文本和以电子介质为载体的电子文本”（“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9），并且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以脑文本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文本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1）。换句话说，既然文学作品在艺术的世界里再现社会现实的道德伦理现象，那么“研究文本需要深入到更深层次即大脑层面进行探讨，才有可能打开新思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0）。正是在脑文本这一层面上，社会、作者、作品、读者等多方融合，彼此交织，形成一个伦理关系的网络体系。

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等多篇论文中详细讨论了脑文本的定义以及它的形成机制，这对于我们认识脑文本的特征具有指引作用。同时，脑文本概念的引入进一步增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力度和说服力。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

对于文学作品伦理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文学作品中包含的道德范例、榜样和说教，也只有转换成脑文本后才能形成观念和思想，发挥褒扬或劝喻、鼓励或批评、赞扬或警示的作用，从而实现教诲目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1）。

鉴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以伦理选择为基础形成的文本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9），我们再次不妨从伦理选择入手，并结合前文例举的“具有警示或劝诫作用的伦理选择”和“体现楷模或榜样作用的伦理选择”两类作品，探讨脑文本与道德教诲功能的实现。

按照聂珍钊教授的观点：“文学文本需要通过脑文本才能发挥教诲功能。只有脑文本才能决定人如何进行伦理选择，才能决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和道德。脑文本为认识文学的教诲功能找到了新途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1）。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一文中，聂珍钊教授与王永教授就“作家脑文本的形成到文学文本”（175）这一话题做了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借鉴李永教授在讨论中所运用的“脑概念→脑文本→文学文本”这一思路，我们在这里不妨将之与读者接受过程中的脑文本和读者的阅读活动结合起来，把文学道德教诲功能的发生过程进一步扩展为“文学文本→脑文本→脑概念”。如下图所示：

序号	阶段	主要内容
1	文学文本	具有教诲功能，并以书写材料为载体的文学作品
2	脑文本	读者阅读到的文学作品与其原初脑文本（与读者世界观、人生观、生活经历等相关）存在“距离”，并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文学作品通过楷模、榜样、失足者、恶棍等范例（高于读者或低于读者脑文本中已有的形象）的伦理选择唤醒读者的以往记忆，打破他（她）们的“期待视野”，并通过“视野融合”实现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对读者的教诲功能
3	脑概念	脑概念是脑文本的产物，也是产生新的脑文本的基础；同时，能够形成提供教诲功能的文学脑文本

如果说“文学在形式上是关于文本的艺术，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表达的艺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2），那么，正是通过脑文本的作用，文学才是具有实现道德教诲功能的艺术。这也再次印证了聂珍钊教授所指出的：“文学作品或戏剧中人物不同的伦理选择及其选择的后果在读者或观众身上引起的不同心理、情感等反应，都是文学作品内在作用的体现，是文学教诲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7）。

### 结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聂珍钊教授长期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思想结晶。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充分体现出了他对文学批评现状的整体把

握和对文学研究走向的深切关怀。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一文中，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文学伦理学批评宽阔的理论蕴含和灵活的适用性，体会出其坚定的价值立场、理论建构的开放性和独特的文本观等特征，这也再次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建设性的、充满潜力的实用性批评方法。与此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蕴以及它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意义，有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 Works Cited

- 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史》（上册），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Fielding, Henry.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Vol. I. Trans. Zhang Guro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5.]
- J.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Miller, J. Hillis. *On Literature*. Trans. Qin Liya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6-24。  
[Nie Zhenzhao. “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New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04): 16-24.]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06）：8-17。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oral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2006): 8-17.]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 聂珍钊、王永：“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外国文学》4（2019）：166-175。  
[Nie Zhenzhao, Wang Yo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Brain Text: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9):166-175.]
- 尚必武：“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话语”，《文艺报》2014-08-11。  
[Shang Biwu.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Newspaper of Literature and Art*, 2014-08-11.]
- Smith, Alexander.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Lives and Robberies of the Most Notorious Highwaymen....* Ed. Arthur L. Hayward.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Ltd., 1926.
-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刘建刚、闫建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Trans. Liu Jiangan, Yan Jianhua.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20.]